

1308



长河文史资料

第九辑

y41381.06

长汀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

目 录

文 史 资 料

难忘的狂欢之夜·····	曹永德 曹培基 (1)
抗战时期长汀见闻·····	范汝森 (4)
“一二·九”在上海同济大学·····	李鸿模 (9)
救护医疗在抗日战争的前方·····	曹永德 (15)
一件珍贵的文物——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护照·····	邓木榕 (18)
瞿秋白同志纪念碑文·····	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供稿 (20)
二战时期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初探·····	李文生 (21)
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钟屋村·····	陈盛樟 (26)
中华苏维埃福建省邮务管理局史略·····	陈茂金 (28)
第一个为红军服务的医院——汀州福音医院·····	肖爱莲、陈伟田 (33)
回忆福建军区随营学校在南阳·····	丘大经 (36)
俞炳辉同志谈苏区时期妇女运动·····	于莲花 (39)
长汀的解放斗争和初期政权建设·····	俞清漪、涂 蒸 (42)
汀瑞县委领导的古城、四都地下支部的活动概况·····	袁必清 (45)
长汀解放前中等教育发展概略·····	马传纲、邹钟庆 (47)
长汀师范学校简史·····	长汀师范校史编写组 (53)
长汀县地理概况·····	刘俊勋 (59)
庵杰涵前溶洞初探·····	陈文林、傅火长、陈伟田 (62)
长汀客家话漫谈·····	曹培基 (64)
长汀方言杂谈·····	毛河先 (66)
郭凤鸣兴亡史·····	木 容 (68)
旧吏轶闻·····	承 亮 (73)

文 史 考 究

从《永乐大典》看汀州·····	王其森 (76)
记南明大臣傅冠事略·····	枫 林 (79)

临 汀 文 苑

词·····	童家贤 (81)
凯庐题画诗·····	康晓峰 (82)
临汀散叶·····	邹子彬 (83)
页二、页三·····	陈文林、范汝森、邓木榕 供稿

难忘的狂欢之夜

(一)

初秋的长汀还是炎热的。人们所谓“秋老虎”就是指这个初秋火热的天气，有似老虎一样可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傍晚，夜幕降临，逐渐地覆盖了整个长汀城，忙碌了一整天的勤劳的人们，为了掸除身心的疲劳，舒散体中的郁热，一群群地走向街头。凉风习习，拂去了人们的困倦，使整个街头显得异常的活跃。

随着夜幕的深沉，街头熙来攘往的人群逐渐地稀少，汀城又慢慢地恢复了宁静。

突然，真是突然，不知从何处飞来的欢呼声，划破了静肃的长空，霎时间，宛似波涛汹涌，奔腾澎湃，欢呼声、鞭炮声……，整个长汀城在沸腾！我急忙启门外视，见四面八方的人流，涌向街头，大家高呼：“胜利了！”“胜利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人们奔走相告，互相庆贺，那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喜悦的情景，简直使整座长汀城都沉浸在蜜水之中。连空气都是甜的。这是由于我中华儿女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过尽半殖民地牛马似的生活，而今抗战胜利了，炎黄子孙得以扬眉吐气。这种欢乐、欣慰的气氛洋溢着、弥漫着，是难以平静的。

街头上的人潮越涌越挤，欢呼的声音越来越宏大、响亮。爆竹声响彻天际，真是热闹非凡！移时中山公园那方尘头四起，一簇簇的人头攒动，像山洪暴发，倾泻而下，原来是国立厦门大学 and 国立中正医学院师生倾校而来，壮大的行列，蔚为大观。更有奇特的行列是老教授搀扶着老夫人也参加游行。他们一会儿高呼口号，一会儿引吭高歌；年轻的男女学生载歌载舞，大伙儿跟着旋律，在大街上跳起了“土风舞”、“华尔兹”，有的还跳了“探戈”。他们尽情狂欢、歌舞、拥抱，老太婆们也迈着她们解放了的“三寸金莲”，蹒跚地卷入了舞群，歪歪扭扭在摇曳着她们不十分稳健的身躯，她们口中还喃喃有词，可是，谁也听不清她们所哼的是欢乐的歌曲，还是祈祷念的金刚经，或是圣经灵诗？真是耐人寻味，使人捧腹。

长汀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抗敌剧团的同志们，也不约而同地来了不少，他们因胜利流露出的欢乐、鼓舞的心情也不后人。他们喜形于色，随着欢乐的人潮翩翩起舞、尽情地欢唱！我们到了水东桥头，迎面来了一大群驻守长汀的美国空军人员，他们燃放鞭炮，狂欢浪舞，途为之塞。先行的厦门大学与中正医学院的教授与他们相互道贺、彼此拥抱，在和谐、欢乐、愉快的气氛中，大家高呼OK！victory！

我们到了水东街，沿途大街小巷已为笑容满面、无比欢畅的乡亲们挤得水泄不通了。人群中有亲友们向我招手，我也挥手以示祝贺，异口同声高喊“日本鬼子打倒了！”“我们抗战胜利了！”欢快的人群走到原“中南旅运社”美国盟军飞行大队的驻地门外，那儿站着许多美国空军人员，与行人互放鞭炮，将两响高陞爆横向人群放射，以至人群向后翻仰。东

倒西歪。有的走失了同伴，有的丢掉了鞋子，更有的撕破衣服，烫伤了皮肤，……大家都狂喜得忘其所以，携带爆竹的行人，立即点燃着来一个回敬，于是“爆竹仗”打起来了。噼啪之声有如战场，双方互不示弱，各自逞雄。这时却便宜了售爆竹的店家，恭喜发财，喜得连连叫好。整个长汀城的爆竹，一夜之间全部销售净光。打爆竹战的双方相持许久，一直打到“弹尽”而止。这种场面，在长汀实属空前盛况。

爆竹仗因弹尽而告终，时已是子夜过后的时分了，人潮逐渐退落，但是，许多年青小伙子还在引吭高歌，倾情歌舞。美国盟军纸弹告罄，欢乐的情绪犹方兴未艾。他们遂施放照明弹、曳光弹、信号弹，顿时空中五光十色，闪烁辉煌。过时，我们才感觉到疲乏，拖着倦腿，各自怀着说不尽的欢欣心情回到家中，但仍辗转床第，久久不能入寝，不时从远处还传来歌声和欢笑声，直是声声入耳，逼人神驰！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权代表外务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向盟国无条件地投降，在投降仪式上低头服气地签了字。它向全世界正式宣告：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彻底胜利了！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铁蹄下，半壁河山惨遭蹂躏，亿万骨肉同胞受尽国破家亡的痛苦。全国人民坚持了八年抗战，赢得了胜利解放，凡是炎黄子孙都值得骄傲、自豪、快慰、欢乐的啊！为了庆祝这伟大辉煌的胜利，全国各地都在兴高采烈地筹备盛大而隆重的庆祝大典，长汀和全国各地一样，亦热烈地、积极地进行准备。大街通衢上高搭彩楼，机关单位张灯结彩，许多商店与居民门前搭起壮观的各式各样的彩门，并张贴对联，洋溢着盛大的节日气氛。

九月三日，长汀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在南寨公共体育场举行。当日中午大会开始，首先，由预先布置好的以北山警报台鸣放警报为信号，接着，全城所有工厂、机关、学校以及居民家中所有能够发出声响的用具，如钟、钹、锣、鼓……同时大打特敲，喜爆齐鸣，各种声音响汇成宏大的声流，使整个长汀城沉浸在欢乐之中。

盟军美国空军官兵们喜得胜利凯旋，返国有日，无不欢欣雀跃。他们狂欢之下，竟搬出多挺高射机关枪和许多弹药，装在数辆卡车上，向大街驰去，边走边打，直至罗汉岭头，一时街上炮声枪声，震耳欲聋。当日晚上，长汀各界庆祝抗日胜利大游行。火炬、龙灯、花灯、船灯、狮灯、高跷，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尤以狮灯摇头纵身雄姿威猛，高踞于拾轮卡车上，这是匠人别出心裁装扮得玲珑剔透，姿态逼真。更为奇特者，雄狮两眼装上防空用的探照灯，灯光四射，炫耀夺目，令人不能对视。从水东桥头至西外街都照得宛如白昼。

东南运输队出动了大批车辆，运载着化装宣传行列，有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英勇场面，有显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欢欣鼓舞的盛况，还有化装各肤色人种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的和平情景……

乡村来城看热闹的人群涌现街头，有如潮水一浪高过一浪。不但旅店客棧，全告客满。就是城区居民也家家有客，真是盛况空前，使人难以忘怀的日子啊！

曹永德

(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夜幕渐渐地笼罩着长汀城。

人们因怕空袭而提心吊胆的情绪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天气闷热，晚饭后纷纷出外纳凉，或在门前，或在街上，古老的山城显得活跃起来。自从这年初江西赣州沦陷以来，赣南许多机关单位众和群陆续迁汀，城区的居民猛增至十万左右，大街小巷的人群一天天多起来，但人们的忧虑也一天天增加起来。“日本鬼子会不会打到长汀来？”“抗战八年了，这漫长痛苦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这些成了人们关切的主要话题。加上近来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越来越艰难，人们殷切盼望胜利早日降临，能过和平安乐的日子。

这天晚上，我先在门前和邻居谈天，后回到破旧的小房子里，在一盏直冒浓烟昏暗的樟脑油灯下看茅盾的小说《幻灭》。约八点半钟，突然听得房后不远黄丽川新楼上（当时全城最漂亮的楼房，住着美国空军）叭叭叭的枪声和司前街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我正诧异门口座着的人骚动起来，从大街上跑来一个人大声喊道：“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初听不觉一怔，随即也惊呼着，跟着邻居奔向司前街。街上的人群象潮水一般，有涌向水东桥的，有涌向旱桥的，无数鞭炮在人群中爆炸，头上、身上、脚上火花飞进，大家欢呼着惊叫着，营背街、南寨广场、半片街江边枪声大作，美国空军掏着手枪端起冲锋枪，尽情地对天射击，塔岭上和北山上的高射机枪也欢叫起来，深蓝色的天空中五彩缤纷，象无数金龙飞舞，象盛开的火树银花，天上、地上都欢腾起来，全城每个角落都响起了鞭炮，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和各种枪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惊天动地。

但最震撼人心的是狂欢的人流，发自肺腑的欢呼声，象火山爆发，江河咆哮，群狮怒吼，东海呼啸。大街上万头攒动，你挤着我，我挤着你，磨肩擦背，鞋子掉了光着脚走，木拖碍事丢在一旁，有人夹在中间，双脚离地，被人流抬着走，有的人踩伤了脚，碰伤了头，也不觉得痛，衣服撕破了也不理会；一个劲地往前冲，一个劲地欢呼，一个劲地鼓掌，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无论本地人外地人，无论中国人美国人，无论大学教授工人农民，互相握手拥抱，互相祝贺欢呼：

“胜利了！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恭喜！恭喜！不要再跑飞机了！”

“OK！OK！顶好！顶好！”

……

大家拼命地喊着、笑着、跳着，多少人脸颊上挂着泪花，激动的泪花，喜悦的泪花，胜利的泪花！唱着各种各样的歌曲，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一位厦门大学的老教授，穿着白长衫，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扶着小孙子，高声吟诵杜甫的诗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摇头晃脑，兴致淋漓。许多人声音嘶哑了，还继续高举双手鼓掌边走边喊，简直鼓着了魔似的，整个汀城沸腾起来，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这真是千载难逢的“狂欢之夜”。

夜深了，但水东街，十字街一带的狂欢的人群仍不舍得散去，鞭炮声、枪声稀疏了，锣鼓声，继续“冬冬锵，冬冬锵”不停地响着。几十家酒楼酒家、饭店茶馆，灯火通明，不仅坐无虚席，而且挤满了人，猜拳干杯，人声喧哗，有的人站着举着酒瓶，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喝着，随即把酒瓶往窗口或门外一甩，同时发出狂欢的笑声。许多人回到家里，继续

抗战期间长汀见闻片断

范汝森

(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各项条件，但蒋介石却一面又命令南方各地限期肃清红军游击队。因此，汀瑞边境仍处于内战之中。1937年秋，汀瑞游击队埋伏于山箭脑伏击从汀州开往瑞金的伪专员秦振夫的汽车，击毙三名押车兵和伤专员的太太，缴枪20余支和金银首饰等。上级党组织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汀瑞游击队在山箭脑伏击伪专员的汽车的消息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局分别派肖忠全和陈丕显前来与游击队联系。陈丕显同志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同时听取了汀瑞县委关于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汇报，一起研究了汀瑞地区当前的斗争任务。

1938年3月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从龙岩至赣州，开赴大江南北，参加抗战。途经长汀时，受到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张鼎丞司令员在欢迎大会上，向群众讲述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十大救国纲领和抗战形势，鼓励大家积极抗日，为民族解放事业出力。

二支队在长汀停留期间，帮助长汀地下党重新恢复了党支部，七天以后，新四军第二支队离开了长汀。

1937年11月厦门大学迁汀办学。当时厦大有一位出色的共产党员，名叫陈松生，

与亲人热烈谈论着、欢笑着，喝酒庆贺，通宵达旦。

这一天，多少地方、多少人民在欢度这狂欢之夜啊。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八年浴血抗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伟大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反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伟大胜利！

难忘的狂欢之夜，永远留在人民心中，但希望历史永远不要重演。

曹培基

是福建南安人。厦大迁汀后，陈松生任数理实验室管理员。“西安事变”以后，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陈松生利用“团结抗日”有利条件，在厦大师生中组织了“草原社”。并在长汀《汀江日报》（1939年12月24日改名《中南日报》）辟一个《草原》副刊，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组织了下乡宣传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陈松生在厦大团结了不少进步学生和职工，组织“读书会”，在进步学生和职工中传阅进步书刊。还组织大家唱红军歌、团歌。在工友中建立“篮球队”和“互助会”，用以联络感情和解决工友的生活困难。在他的宿舍里挂有马克思、列宁的画像。藏有《大众哲学》、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所以大家都喜欢到陈松生家借书和坐谈。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因此，1939年的长汀城充满着白色恐怖的气氛。反动“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专干特务的勾当，对陈松生的活动进行跟踪、盯梢。有一次《草原》副刊登有一篇批评伪县长的文章，陈松生同志被叫去警告：“你的思想太成问题了……”又有一次城里演剧，演到半场突然灯灭，大批传单塞到观众手里，伪保安队长的手枪也丢了，反动派强令对观众逐个搜身，结果一无所获，当局又把陈松生同志叫去警告：“如果再有活动就危险了……！”陈松生同志受到的压力日益增大，长汀另一个地下党支部发现了反动当局对陈松生的注意，情况异常危急，就通过厦大一位工友示意陈松生同志速离长汀，而他却坚持斗争不肯离开，在他遇害前接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要他“弃暗投明”即时离境，否则就要他的命，他看了以后，付之一笑。反动派在恐吓未逞时，对他下毒手了。

1939年8月14日的1个夜里，长汀城下着滂沱大雨，厦大校园漆黑一片，人们已入梦乡。11点钟，西面突然传来隐约的枪声。次日晨，西门外一坐小桥旁发现了一具男尸，这死者就是陈松生同志，显然是反动派所谋杀的。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说他为什么被杀？谁杀的？反动当局却悄放风声：“通敌（日寇）有据”。在出事的第三天，伪《汀江日报》即做了御用宣传，说什么“猜测”为“通敌”被杀，而伪专员公署、伪县政府和伪保安处则装模作样地忙找“凶手”，借机把陈松生同志生前的六七位好友抓走了，过不久因找不到任何证据，只好陆续把他们释放了，这桩暗杀案也就作罢。

1940年伪福建省主席陈仪在《改进》半月刊上发表题为《我的理想国》一文中，公然歧视妇女，反对女子参政，在伪省府机关开始停用女职员，厦大地下党通过厦大女生同学开会展抗议运动，此次运动发动了全体女同学连同教授夫人也发动起来了，她们写标语、在长汀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时印发传单，会上她们同替陈仪辩护的伪专员，伪县长进行了辩论，弄得他们哑口无言，狼狈不堪。她们还给全省各大、中学校的女同学寄标语、传单，号召一致抗议陈议的反动言行。

(二)

“七、七”事变后，日寇派遣空军对我国各城市狂轰滥炸，企图摧毁我国的工商业，还派海军对我国沿海港口进行经济封锁，广大的爱国和进步人士如沙千里、陈翰笙以及同情我国抗日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新西兰籍）等人，极力主张，以合作社组织形式在全国的大

后方，组织工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工合社”）。

1939年夏，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办事处主任路易·艾黎先生来汀开辟工合园地，在汀城席稿坪连城公所创立了工合长汀事务所。路易·艾黎率领人员往福州沦陷区抢运机器和招收失业工人。是年初，工合长汀事务所，开办了机器、印刷、制伞等三个工合社。继之又在城区组成油纸、弹纺、针织、文具、斗笠、卷烟、缝纫、锯板、染织等社。在濯田办起炼铁、木炭、制糖等社；在南山、涂坊办起了造纸社二十几个。此外还办起了榨油、砖瓦等社，城乡共计有39个工合社，贷款总金额达十万余元。长汀工合社的创办，发展了工商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地处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城长汀，由于抗日军兴，先后有外地的许多学校、机关、部队、银行及沦陷区的人民迁来长汀，一时长汀城关人口剧增到十万左右。这时汀城的水东街、半片街、十字街、司前街、营背街开设着银楼、酒家、旅馆、商店、银行……就银行来说，有福建省银行、广东省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长汀办事处。水东桥至车子关一带的汀江河中，停满大木船；装满着商品的货车飞驰在汀瑞、汀龙、汀永等公路上。这时期赣南、闽西的物资都在长汀集散。长汀的大街小巷的行人可说是川流不息，摩肩接踵。这一时期的商业是繁荣的。

（三）

长汀教育在1929年以前颇为发达，居闽西各地之冠。1930年后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破坏。直至抗战以后，长汀的教育才有长足的进步。

“七·七”事变后，外地文化内移，先后有国立厦门大学、省立福州理工高级职业中学（简称福州高工）、国立中正医学院迁汀办学。1941年11月在长汀开办了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当时，高等学校有厦大、中正医学院两所；中专有高工、侨师两所；中学有省中、县中两所；小学有高级小学、初级小学十多所；还有战时民校多所。一时，古老的长汀便成了一座文化城，长汀人民受到了新文化的洗礼，接触了现代科学和文化。许多名流学者来过长汀，或到厦门大学任教或讲学。如李四光到厦门大学讲“地球物理”；王亚南担任了经济系主任；洪声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讲课。施蛰存、林庚、李笠都请来厦大任教；谢玉铭、傅鹰、卢嘉锡、萨本栋等担任了理工学院的课程。当时厦大举行学术讲座达二十余次之多；对长汀知识传播和经济建设有很大的帮助。

厦大协助长汀中小学校办学，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帮助很大的。当时厦大教授、讲师及学生中很多人都曾在侨师、省中、县中、乐育小学等校任职或兼课。厦大的潘懋鼎是县立中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县中的首任校长。陈诗启为县中的第二任校长。由于厦大师生的认真教学和努力经营，长汀中小学教学质量日益提高，特别是省中的教学成绩尤为显著、蜚声闽西各县。

厦大的地下党及进步学生对领导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启发大、中、小学生的思想觉悟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厦大中文系进步学生朱一雄，他来县中兼图画课时，不仅认真教我们

画画、刻木刻，他还启发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他为我们同学出的墙刊，取名《原上草》，他教我们用文字、木刻来宣传抗日救国，为我们组织木刻小组进行抗日宣传。

还有兼过我们音乐课的厦大学生谢雪如，她通过教歌来激励同学们的抗日爱国热忱，她教唱《古城颂》是据《延安颂》改的，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延安才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中心。

长汀这座山城，自古是州郡路府的治所地，向来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加上抗日以来由于外地文化的内迁和长汀地方人士的努力，这里的文风是很盛的，许多外来的人都仿佛置身于文明城市之中。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抗战的需要，长汀先后创办了《汀江日报》（后改为《中南日报》）、《汀州青年报》、《民治报》，《民声报》等。《汀江日报》每日四版，有国内外及本县新闻并开辟有七、八种副刊，这些副刊是厦大黄开禄博士主编的《经济副刊》，谢主铭博士主编的《科学副刊》，李培圉博士主编的《教育副刊》，冯定璋教授主编的《商学副刊》，周辨明博士主编的《厦大语言文字导刊》等；《民治报》有《燭火》副刊；《民声报》也辟有文艺副刊。

这时期出版的刊物有厦大中文学会主编的《巨图》、厦大战时后方服务团出版的《唯力》、厦大校友总会出版的《厦大通讯》；福州高工出版的《呼声》；省中战时青年后方服务团编辑的《汀铎》；长汀县动员会议前锋社编印的《前锋》；县抗敌后援会出版的《战声》；长汀县中学生编辑的《西源》等。

以上这些报刊都是适应抗战的需要和教育的发展而发行出版的。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宣传抗日救亡，激励人民的抗战热忱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抗敌后援会与抗敌剧团。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的鼓舞下，长汀人民于1937年7、8月间成立了长汀县抗敌后援会，公举了厦大校长萨本栋为名誉会长，该会成员多属大、中、小学的师生及热心抗日的社会人爱国士。县抗敌后援会成立的同时建立了抗敌剧团。还有厦大组织的厦大剧团、铁声歌咏队，省中的汀中剧团，县中剧团，高工剧团等。那时演话剧颇风行，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中国万岁》、《打杀汉奸》、《八百壮士》等。1942年，岩连宁地下党县委宣传部长梁集祥同志通过同学、同乡关系，化名梁超鹏到长汀县中任教，后介绍陈玉西（党员）到县中任职，隔蔽下来后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演出大型话剧《春风》、《秋雨》等。这时候常有外地的戏班来汀演出，如京戏有“金福莲”、“新正吉”、楚戏有“聚福台”。这些戏班有时也演一些抗战新剧。

（四）

人心惶惶地过个年。1945年1月赣州沦于日寇的铁蹄下，更加暴露了国民党腐败的实质，长汀一些有权势的人，早就溜之大吉。此时正是农历十二月，过年就要来到，人民害怕过不了年，就要当亡国奴了。除夕那天，长汀城乡就这样人心惶惶地度过。1945年的老历年。

长汀机场在反击日寇中的作用。抗战期间长汀驻有空军十三总站、南昌空军十二总站，军事委员会东南运输队及十九工程处、美国十四航空总队某支队（陈纳德飞行大队）等。长

汀的机场自1936年12月建造后，于1939年10月9日空军十三总站长汀飞行场又扩大范围，直至1943年7月，再一次扩建。长汀的万魁塔（东塔）因有碍飞行，就在此时拆毁的。

1944年3月末的一天，美国飞机60余架降落长汀机场，据说准备参加轰炸琉球的日寇。当天一架野马式飞机准备下降，突然坠毁在西门外的火炉心的山沟里。就在那天晚上，日机飞来偷袭机场，汀城四周的高炮、高射机枪以密集火力射击一架日机带伤遁去。

长汀机场投入使用后，美机往返频繁，日机不敢轻易来汀破坏了。长汀机场的飞机也参加过反击日寇的战斗，这个机场在打击日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准备条件，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以后人民军队继续加强反攻。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的日本侵略军。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八月十日，日本被迫发出屈降照会。是日晚上，喜讯传来，全城沸腾，居民群众奔走相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彻夜不息，人们涌向街头，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盛况空前，堪称狂欢之夜。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汀城十来万人民，听到日本屈降的消息时，长汀的鞭炮，瓶子酒都购一空，人们纵情欢呼跳跃，放鞭炮，喝酒……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怪不得许多老人抢至今回忆起当时的盛况，都说他们是平生的头一回。

九月二日，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九月三日，长汀各界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城区到处张灯结彩，悬挂我国及英、美、苏等国国旗。上午八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大会开始，鸣礼炮（高射机关枪）一〇一响，并施发警报十分钟。下午公演京剧，晚上火炬游行。此外还有舞龙，舞狮，踩高跷，跑旱船，扛台阁，和放焰火等庆祝活动，

参 考 资 料

《汀江红旗》第二辑

《长汀文史资料》第一、二、四、六、七辑

长汀方志办编《1935——1949年档案部分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问真《党的好儿女——陈松生》

醒民《在抗战中生长的长汀教育》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18页

《闽西文丛》1981年二、三期

“一二·九”运动在上海同济大学

李 鸿 模

一 场 暴 风 雨 在 酝 酿 中

同济大学经历了两个“一二九”。一个是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九日（“一二·九”），一个是一九四八年的一月二十九日（“一·二九”）。

一九三五年的那次“一二·九”运动是由北平的同学发动然后波及全国的。其实远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就已酝酿很长时间了。

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场到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日寇侵华运动紧锣密鼓步步加剧，华北的形势日趋危急，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到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眼看一场大风暴就要降临了。

那时我到同济才几个月，在德文补习科就读。我住第一宿舍楼下一层。楼上住的是本科的同学。我经常去的是李莹来和刘儒英两位同学的宿舍，李同屋的有汪珊同学，同屋的有徐驰同学。

李莹来是朝鲜人，是早已失去祖国的人了。他既是激进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会多种语言文字，除朝鲜文外，还会中文、日文、英文、德文和世界语。他在政治上很活跃，和校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在他那里我经常看到地下“文委”的出版物。那是一种六十四开版本的油印刊物，经常转载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党报党刊上的文章。用一种非常小的魏碑体誊写的油印的，字迹十分秀丽，纸张也很洁白。如果现在谁还保存一本的话，那将是一件难得的珍品了。

刘儒英是山东滕县人，是由同济附中升上来的。在附中时他就倾向革命，和当时的CY梁成广、叶德懋（又名叶林，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等同学比较接近。他和李莹来的性格稍有不同、是个内向的人。他喜欢读书，虽是个工科学生，但常抱着一本厚厚的《资本论》。在他那里我经常可以看到巴黎《救国时报》和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他和校外的徐冰、邢西萍等同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那时群众的救亡组织有“民族武装自卫会”和“抗日青年团”。我们虽没有举行过什么参加仪式或履行过什么样的手续，由于我们〔其中有林辉（陈平）、黄铭光（程望）、徐驰、汪珊（汪海粟）、顾德熹等同学〕常在他们屋里活动，政治上的一根纽带早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当时我们德文速成科有三十来个同学。我和刘雨荪等同学共同编辑我们班的壁报。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工科和医科的预备生，功课的压力很大，但我们不能不关心政治。设想一旦亡了国。做

了亡国奴，我们所学的东西会将为谁服务呢？是先读好书再来救国，还是先救国再来读书呢？在我们班的这份壁报上曾认真辩论了一番。以我和刘雨荪为一方，以钱钟仪为另一方、互相争论了好一阵子。钱钟仪是我们这个班年纪最轻的一个同学，当时不过十六岁，听说他哥哥就是著名的学者钱钟书。别看年纪小，学习成绩可说是全班最优秀中的一个。争论结果，钱钟仪同学同意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总算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小钱后来也成了学运中的积极分子。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祖国的各个角落，从白山黑水、江淮河汉、三湘七泽、九嶷五岭、滇池珠江。他们怀着治病救人、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来到同济，我们中虽没有一个学政治的，但每一个人都关心着政治。我们中也不乏出身豪门富商、达官显宦的人家子弟，例如王国宾的祖父就做过满清皇朝的江苏巡抚，但我没发现有哪一个同情与支持国民党不打日本打内战的。相反，他们谁都赞成抗日，谁都反对内战。当时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从南京路大示威到赴宁请愿

一声霹雳，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终于爆发了！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爱国学生运动的一次新的发动。反动当局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竟不措倒行逆施，用水龙头、大刀片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學生，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义愤。随之而来的是“一二·一六”的又一次大的抗议示威。在故都北平投下的这块巨石，击破了平静的湖面，它的影响像波纹一样，一圈一圈地扩展到了全国所有其它各大城市。

在“一二·一六”之后的几天，北平南下宣传的同学来到我们同济。他们声泪俱下，向全体同学介绍了北平同学两次示威及受到镇压的情况，它像一支火炬，点燃了同学们心头怒火，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敌投降对内镇压”的倒行逆施再也不能忍受了。

经过各校之间的秘密串连，一致决定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南京路举行全市学生的大示威。发动地点定在南京路的大陆商场，时间是上午十点正，以燃放一挂鞭炮作为集合发动的讯号。

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个不平凡的早晨，为了发动全校同学去参加示威，我提前敲响了设在游泳池旁的校钟。我们班的同学们首先应声集合，奔赴市里。这时本科的同学们一听·K（德文速成科的简称）的同学（当时我们年级最低）都走了，于是由朱洪元敲响了第二次钟，把全校同学都集合拢来了（约六百人），直奔吴淞车站。位于车站附近的附中同学闻讯之后连集合都来不及，就直接从课堂跑了出来，有的是越窗而出的，大家一齐奔向南京路，参加游行示威的行列。

话分两头，先到的同学们三三两两来到大陆商场的附近，装作逛商店的模样。因为那时南京路还是英帝国主义的租界，理所当然，他们决不允许人们在这里举行示威的。

时针指着十点。突然，霹雳啪啦一阵鞭炮声在大陆商场阳台上响起来，人们像受到磁铁的吸引一样，象潮水般地从各个角落里涌向市场附近的大马路，象训练有素的队伍一样，自动地排成四人一排的行列，路臂挽着路臂，向着西藏路，向着江湾，向着吴铁城的国民党市政府前进。一路上大家又是唱歌，又是喊口号，一直来到天通庵附近。迎面看到的是一堵警察和宪兵组成的人墙，堵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显然，这是预先有准备的。这时我们齐声喊了起来：

“欢迎警察同胞们和我们一起参加示威！”

“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驱逐日寇出中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喊呀，喊呀，我们把嗓子都喊哑了也无济于事。要知道那都是一些挑选出来的彪形大汉，我们一个劲儿地往前挤，但怎么也冲不过去。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手挽着手走在第一排，我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上南京请愿去！”于是我们掉转头来向北站进发。等我们到达北站时，可巧站台上停放着两列空着的客车，我们同济同学一涌而上，占了前面的一列车，复旦、交大和其他学校的同学则占据了后面的那一列车。

当我们刚刚坐定，喘了口气，这时一大帮身穿黄色卡叽布警服、手持棍棒的警察列队开进了月台，然后将队形疏开，当着我们的面操演起棍棒来。我们一边瞧着，一边鼓掌，大唱起“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子，此伏彼起，唱了一遍又一遍。警察们看到这种情景，知道他们那番表演不起任何作用，只好无可奈何地撤走了。

时已过午，同志们已饥肠辘辘，赖有上海各界救国会为我们筹集了大量食品，得以免于挨饿。

这样坚持到了黄昏，经同学们的努力，总算动员了几个司机把我们的列车开出了北站，同济在前，复旦、交大等校再后，沿着我们前辈同学们在“九·一八”事变后曾走过的道路，朝着南京的方向前进。列车风驰电掣地向前飞奔了一阵，突然慢慢地停了下来。

事后得知，开我们前面这列车的司机，原来受命把我们开到一定的地点后就设法溜掉，把我们甩在身不着边的荒野里。当时我们押车的同志由于缺乏经验，没能看住他们。

怎么办？幸好同济附属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当时设于江湾原上海劳动大学旧址）的几位同学，有景智德、郑文道、郑香山等人曾学过操纵火车头。他们自告奋勇，把火车开动，继续缓慢地朝前行驶，眼看天已破晓，突然火车又停住了。原来车头锅炉里的水烧干了。可巧火车停在离一个大池塘不远的地方，这时男女同学纷纷跳下车来跑到附近老乡家里借来各式各样的容器，有水桶、脸盆、瓦罐等等，人们排成一列列的传送队，从池塘里打起水来，硬是把一个偌大的火车头灌得满满当当的。最辛苦的是两位站在火车头上面往里倒水的同学，他们一息不停地往里倒，虽是隆冬也累得满身大汗。

呼隆隆，呼隆隆，火车又启动前进了。

这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已经坐不住了，赶忙电告吴铁城派了上海市的教育局长潘公展坐着小车以飞快的速度赶上我们，给我们送来了蒋介石的电报，妄图以某些不兑现的空头支票来阻止我们前进。这真叫痴心妄想！我们根本不予理会，只管继续前进。

蒋介石一计未成，又生二计。他竟下令将我们前进路上的铁轨拆除了一段并筑起了路障。但你能拆，我就不能修吗？于是我们停车下来，清除了路障，又重新铺好了铁轨继续前进。

蒋介石眼看软的不成，就来硬的了。这回他索性动用了铁甲车，照直朝我们开了过来。路就是那么一条，绕道是不可能的。这样僵持了一个时候，看来我们不能不改变策略，先答

应返校，然后再作下一步计议。这一来，司机又上来了，列车以加倍的速度，连夜从昆山一口气开回吴淞，连上海站也没取停一停。

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深夜。租界里的洋大人们正在酣歌漫舞，欢度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到的圣诞佳节。天空中飘着片片雪花，夜幕阴沉。霓虹灯也似乎变得暗淡无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都在思考着我们民族的命运和今后的斗争，谁还有心去欣赏那五光十色的夜景呢？

诉诸群众，到人民中间去

人虽然回到了学校，可谁也无心念书了。全校的同学们分别组织了三个宣传团。一路去江北，一路去京沪线，一路去沪杭线。根据自己的自愿，自由报名。

我和王国宾、钟思、欧裕昆、朱声度等同学参加了沪杭线的宣传团。王国宾同学对戏剧颇有研究，很快就突击写了一个脚本，以备外出宣传之用。

第一站是淞江，那是一座不大的小城市，街头非常窄小，但人烟却很稠密。到街上，一声招呼，人们都围上来了。大概自打松江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外地来过这么多“洋学生”吧。老乡们好奇地听着我们宣讲，虽不见得完全能听懂我们的话，但却都报以热烈的鼓掌。

第二站是嘉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儿完成的。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坐在一条船上秘密地开会，而现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已为许多人所受，可以通过我们这一群青年学生公开地传播了到群众中间去了。国民党的反动派的专员看到我们的突然出现，惶恐不安，如临大敌，妄图制止我们的宣传活动。为此我们还演了一出“大闹嘉兴府”的话剧，吓得那专员不敢出来答话。钟思同学操着他那别扭的“广东官话”，幽默地指着那高高的城关，说了一句话：“你瞧那城墙，好不似一付狗齿！”

第三站是杭州。我们在市里进行分头宣传之后，专程去瞻仰了岳坟。看到那跪在岳坟前的四个奸臣，越加深了我们对汉奸卖国贼的仇恨。那几天杭州正下大雪，我们在漫天大雪中登上了葛岭，一览西湖的胜景。岭上参天的大树被大雪复盖着厚厚的一层，整个世界如银装素裹，洁白晶莹。这湖光，这山色，这美丽祖国山河，能让它听任敌人肆意蹂躏和玷污吗？

被人们比作天堂、比作西子的杭州，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像宋代词人张孝祥在他的《六州歌头》中所说的那样：“洙泗上、弦歌地、亦膺腥”呢？当你一想到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的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时，又怎能不叫人“忠愤气填膺”呢？

这次出来参加宣传团的活动，我们本身也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不知道为什么，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突然之间、他们变得更可爱了。当我们鼓舞别人起来爱国的时候、自己对他的感情也更加深挚了。

参加这次宣传活动，也使我们这些生长在“象牙之塔”里的“洋包子”接触接触群众。那一张张纯朴无邪的面孔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当时又谁曾想过，今后一生之中，我们注定将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生活和斗争在他们中间，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呢？

让反动派看看我们的颜色

同学们返校之后，蒋介石害怕局势越弄越糟，于是派了两名说客——一个叫刘健群，一个叫张道藩一同来到同济进行安抚。

刘健群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当时是国民党兰衣社的主要头目之一，是个铁杆的法西斯份子。张道藩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是个典型的政客。他们妄图鼓其如簧之舌，前来梳笼梳笼我们这一群“可怜的阿斗”们。

讲演在同济大学的礼堂举行。刘健群首先登上讲台。他这个大草包讲了好几十分钟，胡扯八拉，瞎诌了一顿。他大讲其中国的“固有文化”，讲了些驴唇不对马嘴毫不相干的事情。说什么西洋人几百年前还披着兽皮呢，为了防止上衣散架，所以每人在自己的脖子上系根草绳，而这就是今天的西装领带之由来。听了真叫人啼笑皆非。

然后轮到张道藩上台。他放肆地攻击了这次遍及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胡说什么它干扰了“委座”的“英明决策”。这句话顿时引起了台下一顿自发的强烈的雷鸣般的跺脚声。突如其来的这一下，弄得这位鼻梁上架着付银丝眼镜神气十足的部长大人目瞪口呆，张口结舌，一时不知所措。这一强烈的反应完全是群情愤激的自然流露，是一种不说话的抗议，是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报应！

为了防止学生继续“闹事”，学校当局宣布提前放寒假，算是给这场运动暂时打了个结。在同学们离校以后，我的家里接到学校一份通知，说是因为我违犯了学校校规着令退学。但就在这之后不久，我和林辉，刘儒英三个同学被接受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所更大，更大的革命大学。

注：李鸿模同志系长汀人，现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政委。

附录：关于几个人物的简介

钱钟仪 江苏无锡人，带文补习科学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八年入党后先后在浙江丽水任宣传部长及中心县委委员。一九四二年在浙江瑞安从事抗日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英勇不屈，惨遭杀害。

郑文道 广东香山人，同济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中共党员。抗战期间打入日寇的情报机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从事谍报工作，因东京佐尔格案件株连，被捕后从五层高楼上英勇纵身跳楼牺牲。

郑香山 广东香山人，同济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中共党员。抗战期间在山东浴蒙抗日根据地兵工厂工作，在一九四一年日寇大扫荡时，他只身用一挺刚刚修好的机枪掩护同志们撤退而光荣殉职。

王国宾 又名王震之，北京人，德文补习科学生，中共党员。抗战期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会国解放后任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研究所所长，因编导著名影片《内蒙春光》荣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锦旗奖，一九五三年曾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行，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含冤而死。

钟思 广西人，工学院机械系学生，曾留美学造船，解放后回国，任交通部上海船舶研究所工程师。文革中受迫害，含冤而死。

景智德 又名钱明，山东蓬莱人，中共党员，同济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抗战前参加中共特科地下情报工作，与郑文道一起曾联系中共日本籍党员，其中有许多是日本谍报机关负责人，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1942年有关机关遭到破坏，景机警逃逸。解放后牵涉到潘汉年、杨帆案被无辜长期监禁二十四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平反复职。

李莹来 又名李惟民，工学院机械系学生，朝鲜劳动党党员，曾任中共同济大学党支部书记。抗战期间任华北朝鲜人民反战同盟负责人，“八·一五”后任朝鲜人南满工委书记，回国后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

林辉 又名陈平，福建漳浦人，中共党员，机械系学生。皖南事变中被俘，囚于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冲出敌人的魔掌，长期从事兵工建设，曾任国防工办基建局长。

朱洪元 浙江人，机械系学生，著名的原子能专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

刘雨荪 辽宁人，德文补习科结业后升入本科机械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国航空公司。为解放前夕香港两航起义组织者之一。